

评反面教材
水饼



133

评反面教材《水浒》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 46/16·字数 86,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5,000

统一书号: 10093·115 定价: 0.29 元

毛主席语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目 录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丁 毅 (1)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水浒》评论组	(7)
宋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雅 林 (19)
投降派宋江的丑恶嘴脸·····	林志民 张春雨 (27)
“替天行道”——宋江投降主义的政治纲领	
·····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水浒》评论组	(35)
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衣殿臣 (47)
评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	北 仓 (56)
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策略·····	常效轩 (64)
宋江诗词是他投降派面目的自我暴露·····	冯 宇 (70)
谈金圣叹评《水浒》·····	黄益庸 (84)
评宋江形象分析中的阶级调和论	
·····傅建中 刘 亭	(94)
论晁盖·····	唐逸才 (102)
论李逵·····	张景超 (115)
古代投降派宋江与现代投降派林彪	
·····杨庆旺 汤宝华	(124)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丁 毅

四十多年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写了《流氓的变迁》一文，对自明代以来流行数百年的长篇小说《水浒》，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深刻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它的要害，澄清了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错误观点。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评论文学作品的典范。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好就好在抓住了《水浒》“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揭示了《水浒》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在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开展对《水浒》评论指示的今天，重读鲁迅对《水浒》的论述，使我们深切感到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思想是多么正确而深刻，他的论述是何等精辟而发人深省！同时也深深教育我们，应该进一步向鲁迅学习，更好地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

学习鲁迅评《水浒》，首先要学习他的无产阶级立场。鲁迅写《流氓的变迁》的时候，他已经通过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投身现实的阶级斗争，完成了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由民主

主义思想到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变。这就使他在观察社会现实、评论文艺作品时能够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明辨是非，分清好坏。对劳动人民有利的，他就热情支持；不利的，就坚决反对。鲁迅所以能够一眼看穿《水浒》中歌颂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还在于他在与现代投降派长期斗争中，深刻认识到现代投降派与古代投降派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追根溯源的观察，认清了古今投降派共同的反动本质。鲁迅写《流氓的变迁》时，正是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不久，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当时钻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投机分子，纷纷接受了蒋介石的“招安”，也“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有些投靠敌人的“革命小贩”、文化流氓充当了“正先锋”，攻击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坚定地站在反对当代“天子”蒋介石的立场上，带领革命青年，冲锋陷阵。在斗争中鲁迅积累了丰富的识别投降派的宝贵经验，而对《水浒》的评论正是从现实斗争出发，从古代投降派身上看到了现代投降派的影子，现代投降派也不过是古代投降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个变迁而已。马克思说过，应当“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鲁迅对《水浒》的评论正是持的这种战斗态度。四十多年前，鲁迅评论《水浒》的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告诉我们，只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对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开展斗争，才能保证我们的文学评论工作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沿着

无产阶级的方向前进。

学习鲁迅评《水浒》，还要学习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两千年的历史作了科学的考察。看出天子、将相、儒侠和“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旧制度的维护者；劳苦大众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旧制度的破坏者。《水浒》中的宋江表面上看去是强盗，实际上是“**侠之流**”，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是儒侠的混血儿。他即使在梁山上也充当着大宋皇帝保镖的角色，是替皇帝行道的强盗。宋江一再声言“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他篡改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农民起义路线，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带领起义军跪着去见皇帝，又为天子镇压不“替天行道”的农民革命队伍。他的一切言行，都是“**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这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依附于反动势力的奴才。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敢于藐视孔孟之道，敢于革命造反，敢于反对天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英雄！鲁迅运用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对《水浒》及其主要人物宋江作出了十分正确的评价。

但是过去的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把《水浒》说成是“千古不朽的农民革命的史诗”，把宋江美化为“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把宋江搞投降主义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这显然是错误的。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用阶级斗争和

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因而没有划清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界限，甚至为投降派作辩护。所以我们要正确地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提高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的能力，就必须进一步树立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用这种观点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才能心明眼亮。

学习鲁迅评《水浒》，也要学习他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鲁迅对《水浒》的评论是他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的好例证。列宁在谈到辩证法的要素时提出，认识事物的性质，要从“**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关系的全部总和**”中去掌握。鲁迅在谈到《水浒》的时候不是孤立地随便挑一个事实给以分析，而是从它的历史联系中去把握。两千多年来，奴才们不断改变为主子服务的方式，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离所依赖的反动制度。“万变”是表面现象，“宗”才能说明其本质。宋江之类的“侠之流”，由他们的先辈“汉的大侠”变化而来，跑到水泊里反对奸臣是他们特别采用的忠于天子的一种方式。把握住宋江出现的历史联系，无论他怎样乔装打扮，混到农民起义的队伍里，只要他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旗帜，就能够识别出他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实质，从中看出他与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之间的本质差别，从而得出“终于是奴才”的结论。《水浒》中宋江的出现决不是偶然孤立的文学现象，他是适应那个时代统治阶级镇压农民革命需要而出现的奴才典型。与他的先辈“汉的大侠”、他的谬种清代保镖不同之处，在于他是钻进农民革命队伍内为封建统治者卖命的投降派，是更卑鄙可

恶的奴才。

过去的一些人在评论《水浒》时，只看宋江在农民起义队伍内当首领的表面现象，不看他假革命真出卖的反动本质；只看他反对奸臣的一面，不看他不反天子的一面。这就必然为表面现象所蒙蔽，看不到问题的本质，从而上当受骗。

四十多年前，鲁迅所以能够很好地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评论《水浒》，是和他积极投身火热的阶级斗争，并在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分不开的。二十年代初，当《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著作第一次翻译到中国时，鲁迅就成为首批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此后他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在学习中克服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鲁迅在谈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体会时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水浒》这部书自问世以来应如何评价，可谓一个“很纠缠不清的问题。”但一经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一切就清楚了。

鲁迅评《水浒》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文艺工作者，应当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在这里把对《水浒》的评论，提高到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让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习鲁迅的榜样，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大旗，切实开展好对《水浒》的评论工作，充分发挥它的反面教材作用，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斗争中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水浒》是一部 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水浒》评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毛主席的指示对《水浒》这部书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深刻地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彻底地戳穿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

《水浒》虽然写的是农民起义的题材，但是，作者从反动的政治目的出发，适应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歪曲了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的真实历史，宣扬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歌颂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形象化的反面教材。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首先要看它的思想政治倾向。
《水浒》的思想政治倾向，不是歌颂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是反对农民革命，宣扬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竭力美化皇帝，鼓吹效忠皇帝，由始至终贯串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小说劈头就把宋朝的开国皇帝捧上了天，说什么“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并且把赵家的统治说成是“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水浒》更把梁山农民革命的死敌宋徽宗吹得天花乱坠：什么“至圣至明”，什么“宽仁厚德”，什么“求贤未尝少怠，爱民如恐不及”。本来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封建剥削制度的总代表，《水浒》却这样去吹捧他，为他涂上一层大慈大悲、贤明神圣的灵光，其目的在于由此引出“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的忠君有功和“背正顺逆，天不容恕”的造反有罪的结论。于是，吹捧皇帝，鼓吹效忠皇帝的思想，就成为《水浒》宣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出发点。

《水浒》中，也描写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然而，投降派同农民阶级截然相反，他们反对贪官，只是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效忠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我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最终目的都是要推翻封建王朝和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都是反皇帝的。但是，《水浒》却这样写

道：“至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宋江也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里，《水浒》的作者把败坏国家、涂炭生民、嫉妒贤良、不用人材的罪责轻轻向几个贪官身上一推了事，妄图借此欺骗人民，把既反贪官，也反皇帝的农民革命，纳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水浒》鼓吹“忠为君王恨贼臣”。“恨贼臣”只是手段，“忠为君王”才是目的，这两者是一致的。《水浒》在这里所鼓吹的，决不是什么造反精神，而是彻头彻尾的奴才思想。

《水浒》这部书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和高俅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一个在野，一个在朝，但都是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效忠皇帝，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是他们共同的出发点。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以不反皇帝，不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一旦面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便会为保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尽释前嫌，握手言和了。《水浒》中有一些情节足以说明他们之间这种斗争的性质。第八十回高俅被捉，宋江无怒无怨，不记前仇，扶上堂来，纳头便拜，恳请高俅说：“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死图报。”高俅道：“高某回朝，必当重奏，请降宽恩大赦，前来招安，重赏加官，大小义士，尽食天禄，以为良臣。”这里写的是斗争中有统一，活画出宋江和高俅这两个

道君皇帝忠实奴才的丑象。宋江投降后，每次出征得胜回京都指望皇帝能封官赐爵，但是蔡京和高俅等人再三阻挠，不使实现。这里写的是统一中有斗争，他们原来是皇帝脚下勾心斗角、争宠相吠的一群狗。宋江和高俅之间，无论是摇尾和好，还是扑打撕咬，无论是招安前的明争，还是招安后的暗斗，都是以维护皇帝的封建统治为前提的。《水浒》作者妄图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用混进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冒充革命派；以地主阶级内部的忠奸之争来抹杀和否定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用心，何其歹毒！

《水浒》为了兜售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对农民革命斗争极力歪曲，极端仇视。《水浒》鼓吹革命无理，造反有罪，千方百计迫使农民阶级就范，蛊惑农民阶级俯首帖耳，永远作皇帝的顺民，作统治阶级的奴隶。晁盖等人在黄泥岗七星聚义，智取生辰纲，把农民阶级创造的财富从剥削者手中夺了回来，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点燃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第一把火炬，这是何等大快人心的革命行动！然而，《水浒》的作者却说这是“犯了迷天大罪”。晁盖等人在梁山举起造反大旗，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是多么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可是，《水浒》的作者却煞费苦心，塑造并歌颂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让他改变农民起义的性质，实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使一场石破天惊的农民革命流了产，使农民起义的队伍接受招安，成了封建统治者手中的御用工具。

《水浒》所宣扬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刺向农民起义军的一把软刀子，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为扼杀农民革命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农民革命对于封建统治阶级说来，是眼中钉、肉中刺，不拔掉誓不甘心。这一点对道君皇帝来说，对高俅来说，或者对宿太尉和宋江来说，都是一致的，这是由他们这些统治阶级的不同代表人物的共同阶级利益决定的。但是，“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统治阶级总是把暴力镇压的方法和政治欺骗的方法，互相交替使用。高俅的武装镇压，宿太尉的招抚怀柔，虽然手段彼此不同，但目的却互相一致：都是为了消灭梁山起义军。敌人的武装镇压，比较容易提防；敌人的招安政策，就不容易引起警惕；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为适应敌人的招安政策，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投降主义路线，对革命的破坏和瓦解作用更大。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根本改变了梁山起义军的性质；由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革命武装，变成了皇帝镇压其他农民革命的工具。列宁说：“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所宣扬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也反映了修正主义的一般特征。《水浒》这部

书，正是通过歌颂农民队伍当中的投降派篡夺起义军领导权，改变农民起义路线，来达到瓦解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水浒》决不象有些评论曾经鼓吹的那样，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恰恰相反，《水浒》歌颂投降，鼓吹招安，是地地道道的反面教材。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对我们今天识别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水浒》的思想政治倾向是通过主人公宋江来表现的。在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始终把投降派的典型宋江和他推行的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全书的投降主义的总倾向。

《水浒》中的宋江，是作者蓄意肯定和赞扬的人物。这个宋江完全是作者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在这个艺术形象身上，倾注了作者效忠封建统治阶级的狂热感情和对农民革命极端仇恨的心理。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满脑子孔孟之道的忠君思想。他在郓城衙门充当押司的时候，“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一心想通过仕途爬上去，为皇帝效忠。他听说晁盖聚众起义，认为是干了“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他刺配江州途中，被晁盖等人救出，连套在脖子上的长枷也不让打开，说什么：“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晁盖一再劝他留在山上，他认

为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忠义”二字贯串了宋江的一生。宋江为封建地主阶级尽忠尽义一直到死。

宋江是一个钻进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宋江是迫不得已才上了梁山的。他因“杀惜”刺配江州，在浔阳楼题诗，对类似高俅一类的贪官发牢骚，而被判处死刑。在江州法场被梁山起义军救出后，宋江认为仕途“大道”堵死了，就妄图通过梁山这块特殊的跳板，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走一条“曲线尽忠”的道路。于是，他钻进农民起义队伍，干起反革命的勾当。

宋江干的头一件反革命勾当，就是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他一面当晁盖说“死心踏地，与哥哥同死同生”，一面又大讲“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的谣言，把自己打扮成天命攸归的当然领袖，为篡权制造舆论。他嘴说“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好象是尊重晁盖，实际上却借机掌握实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拉山头，搞宗派，拼凑投降派的黑班底。在晁盖生前，宋江就已经把梁山起义军人事大权和军事大权的很大一部分揽到手里。晁盖死时，并没指定他为接班人，可他却迫不及待地坐了第一把交椅。

宋江另一件反革命勾当，就是篡改起义军的路线。晁盖刚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忠义”与“聚义”，不是一个字的更改，而是对晁盖那一整套农民起义路线的“修正”。以后，他在思想舆论和组织工作上的准备完全成熟，便搞了一次“大聚义”，提出“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